

密 级： 无
论文字数： 2.2万

军事科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清末军人素质观念研究

研究生姓名： 毛 笑 冰
年 级： 九 六 级
指 导 老 师： 皮明勇副研究员
学 科 专 业： 军 事 思 想

一九九九年六月

分类号 _____ 密级 无
UDC _____

学 位 论 文

清末军人素质观念研究

毛 笑 冰

指导老师姓名 皮 明 勇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 副研究员

申请学位级别 硕 士 专业名称 军事思想

论文提交日期 1999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1999 年 6 月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 军事科学院 1999 年 7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傅立群副部长 研究员

评阅人 方 堃 副研究员 刘 庆 副研究员

1999 年 6 月

内容提要

军事近代化的核心是军人素质的近代化。本论文选取清朝本年(1895—1911年)的军人素质观念进行专题探讨,力图揭示军人素质观念与军事变革的关系,以深化对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

论文首先追溯了传统军人素质观念在近代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产生于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军人素质观念已不能完全适应近代战争和近代军队建设的需要。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惨败揭示出改造清军官兵素质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前,清朝官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明显滞后,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军事近代化的发展水平。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官兵素质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人们对于改进官兵素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而在“德”、“知”、“能”、“体”诸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军人素质标准,并就如何培养新的军人素质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清末军人素质的这种变化既是军事近代化的一部分,反过来又推动了军事近代化其他层面的发展,并对于改善清末军人的整体素质,提高新军的战斗力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论文最后从军队官兵素质改进的重要性、艰巨性、规律性等三个方面对清末军人素质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以求对今天的军队改革与军队建设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主题词: 军人素质观念 近代化

ABSTRACT

The core of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l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ldier quality.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sense of soldier quality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a view to reveal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nse of soldier quality and military evolution, and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force building.

Having looked into the awkward predicament in whic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ense of soldier quality was placed in modern tim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soldier quality originated in the Cold Steel period cannot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wars and force building in modern times. The fiasco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Opium War revealed the necessity to improve its soldier quality, which, however, the Qing Dynasty failed to realize up to the eve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he defeat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war of 1894-1895 made the issue of soldier qualit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or all walks of the society. People began to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improvement on soldier quality, and put forward some new criteria and new ways of thinking. This change was a part of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in tur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aspects of th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entire soldier quality and the New Army's combat capability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finally sums up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ense of soldier quality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importance, arduousness and regularity so as to offer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oday's force building.

Key words: Sense of soldier quality, Modernization

目 录

一、传统的困境与变革的呼声

- (一) 中国传统军人素质观念的基本特点
- (二) 甲午战争前清朝官绅改造军人素质的初步尝试及其局限
- (三)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改造军人素质的呼唤

二、新的军人素质标准的提出

- (一) 关于军官所应具备的素质
- (二) 关于士兵所应具备的素质

三、提出培育军人素质的新办法

- (一) 通过调整政策、制度来促进军人素质的改善
- (二) 加强教育以提高官兵素质
- (三) 通过严格训练和灌输教育来提高素质

四、军人素质观念的变化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推进

- (一) 围绕改造官兵素质而进行的军事近代化变革
- (二) 新军官兵素质状况的改善与新军战斗力水平的提高

五、思考与启示

附：参考书目

军人素质观念，主要是关于军队官兵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如何培养这种素质的认识与态度，也包括对如何选拔任用具备相应素质的官兵、以及应给予他们何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认识。军人素质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尽管总是要围绕军人的品质、知识、能力、体魄等几个方面，但每个时代的认识 and 态度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对军队建设产生直接的作用，会对国家的强弱盛衰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初期阶段，人们偏重于武器装备的更新，对于用近代观念来改选军人素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种观念上的滞后，直接影响到军队建设，并导致在甲午战争中丧师辱国。此后人们开始认识到，提高人的素质是军事近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要提高人的素质，又必须首先认清近代军人在素质方面的基本要求以及培育这种素质的主要办法。尽管在这方面的认识突破来得很迟，但观念的更新还是促进了军事近代化的迅速发展，使军队建设出现了新的景象。

本文通过研究清末（1895~1911 年）军人素质观念，梳理出当时人们对于改造军人素质的认识，并结合军人素质实际情况来审视这些观念的实现程度。文章旨在发掘军事近代化所留给我们的历史财富，为军事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传统的困境与变革的呼声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将帅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论兵者一般都很关注军人的素质问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古代军人素质观念。这种观念经过数千年的承传和演变，到了晚清之后，其指向和功能已不能完全适应近代军队建设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带来了种种影响。

（一）中国传统军人素质观念的基本特点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明确提出将领必须足智多谋，具备必要的战争知识和超常的才能；言信必果，对上对下都说一不二；仁爱有加，对部下有一颗慈母心；有胆有魄，敢于决新敢为人先；一身正气，以威严服众心。《孙子》对将领素质所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要求，具有较强的涵差性，基本上代表了先秦时代的认识水平。《六韬》、《尉缭子》和《三略》等早期兵书对此也都有过类似的论述。秦汉以后，人们对军队将领素质的认识，越来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带有儒家文化的气息。儒家文化推崇德治主义，强调军官的素质必须是德才兼备而以德为尚，并要求军官自觉用礼教纲常来规范自己的行

为。人们把将领所应具备的素质进一步进行归纳，将“信”、“仁”、“勇”、“严”统归为“德”，并用封建伦理道德加以规范，主要是指忠君爱国、志向远大、正直诚实、廉洁奉公等思想品质。同时，还将“智”细分为“才”、“识”、“艺”：“才”，即指挥、管理、训练能力；“识”，指掌握与战争、军事问题有关的各种知识以及相应见解；“艺”，即军事技艺，主要是指使用各种武器的本领^①。从历史的长期演变过程来看，传统军人素质观念逐渐表现出重品德轻学识的倾向。

中国古人对士兵素质的要求不高，它所重视的，一是士兵的绝对服从精神，二是必要的战斗技能。苏洵说：“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可与之皆死。”^②与这种“愚兵”思想直接联系的是“愚兵”政策，依靠严酷的军纪和礼教纲常的系统灌输，以养成士兵绝对忠于将领和封建王朝、自觉维护军事纪律的习惯性思维。中国古人还主张通过严格的训练，使士兵掌握单兵作战对击刺劈砍等使用武器的技巧，熟悉集团作战时方阵战术所必需的步伐整齐、进退划一。

（二）甲午战争前清朝官绅改造军人素质的初步尝试及其局限

进入近代以后，东西方军事文明多次在战场上进行全而较量。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旧式军队官兵素质的局限性明显地暴露出来。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军官，绝大多数人缺乏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甚至是目不识丁。他们对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近代军事知识一窍不通，基本上不具备管理近代军队和指挥近代战争的能力。特别是清军高级指挥官多已老迈，像前线总指挥湖南提督杨芳、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等高级军官均是七旬左右的老叟，体力、精力都已不济，无复当年之勇。他们中的关天培、陈化成等人虽有心报国，但面对强敌，却无法不辱使命。至于士兵，其素质之低更是令人惊讶。“今日之兵，……老弱充数，则兵即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兵更不安

^① “德、识、才、艺”的提法可见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将》和《练兵实纪杂集·储练通论》；范中义先生所著《戚继光评传》一书中对此有过论述，见该书第142-148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宋史》，卷443，列传第202，《苏洵》。

兵。”^①这样的素质即使是与传统军人素质观念的要求也相去甚远，根本不可能在近代战争中有所作为。

与清军官兵素质低下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中国发动侵略的英国等西方军队的官兵却具有较好的素质，特别是具备良好的近代技战术素养。在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军人素质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当时西方一般人的心目中，军人尤其是军官应该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不仅要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西且还必须具备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每个军队官兵都应“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战争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②。

尽管鸦片战争便已经揭示出改造清军官兵素质的必要性，但清朝官绅对此问题的主观认识却并不能一步到位，西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曲折的过程。在 19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初，清朝官绅对西方军队建设理论还知之甚少，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又迫使他们尽快拿出解决清军官兵素质低下的问题，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人便尽力从中国传统军人素质观念中吸取营养。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通过“以书生带山农”，借助书生的“忠义血性”，为湘军官兵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支持。他又力主将湘军的武器装备保持在低水平上，并简化湘军的营制规章，相对降低对湘军军官的近代军事知识需求。这种刻意回避军事发展的时代潮流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军人素质观念发展史上不具有创新意义，也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军人素质问题的正确出路。

到了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清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李鸿章等人开始认识到用近代军人的素质要求来改革清军的必要性。李鸿章深切地感受到官兵“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③。他的着眼点是使官兵具备与近代武器相适应的近代军事知识，主要办法是兴办军事学堂，“以学堂为根本”^④，发展近代军事教育。与此同时，他还认真引进西式操法，对淮军进行新式军事训练，提高了淮军官兵的军事素质。在创办北洋海军时，李鸿章对官兵素质的重要性又有了新的认识，注重任

^①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 36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册，第 155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64 年版。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3，第 42 页。

^④ “丛刊”：《洋务运动》（二），第 461 页。

用受过近代海军专业教育的军官，并主张仿照英国海军，用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官兵的训练。由于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他的官兵素质改造主张也只有局部的新意，与全面实现中国军人素质近代化的客观需求相比，这种认识仍然明显地处于滞后状态。

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的军事理论状况和军事实践结果，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中国传统军人素质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改变军人素质既是军事近代化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军事近代化能够系统深入的一项重要保证。而且，近代条件下的军人素质更新，靠回归传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囿于传统只作局部的改善也解决不了问题。

（三）甲午战争后国人对改造军人素质的呼唤

甲午战争是两个后发展国家之间的一次全面较量。尽管与日军的装备水平大体相当，但清军在战场上仍然是一败涂地。于是，官兵素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战争中的表现来看，不仅高级军官严重缺乏近代军事知识，基层官兵对于近代战争更是外行，甚至很多士兵属于临时招募，没有一点军事常识。袁世凯将清军的素质总结为：“为将者不习谋略，为兵者半属惰游。平时而心志不浮，临阵而臂指不使，聚同乌合，败如瓦解。”^②

清军和日军官兵素质上的巨大差距，促使国人第一次深入思索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日本军官都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谙熟近代战争所需要的科技和军事知识，在战场上表现出良好的指挥能力。士兵从国民中征召而来，受到严格系统的训练，军队兵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充分保障，一经战阵则化为强大的战斗力。日本以从军为荣，军人有着很强的爱国心与荣誉感。他们在入伍时以“祈战死”相互勉励，这令曾亲眼目睹的梁启超感慨万千。

通过比较和思索，更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学习日本和西方，对中国军队的官兵素质实行改造。张之洞从“体用”的哲学高度谈到改造官兵素质的必要性，他认为必须达到“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差，将领必不能滥充”的目标，这是“军之体”，“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面言”^③，所以改造官兵素质是个根本问题。胡燏棻从“训官”、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4页。

^② 《袁世凯奏议》中，第53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5，第73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募兵”等几个方面谈到改造官兵素质的重要性，他甚至在奏折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孔孟复生，“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①。康有为认为中国既无兵校、也无练卒，所以官兵素质无法与东西各国相比。他奏请清廷停止武科，广设学校，全面提高军官素质，“兵事乃可得西整理也”^②正如许景澄所总结的那样：甲午战后，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军，为当务之急。

20 世纪初年，军国民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人们对于改造官兵素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些军国民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中国处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之世界”，“其国家必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③，因此，必须摒弃“重文轻武”，“好男不当兵”的社会风气，认识到军人的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面祝者，莫若兵也”^④。在 1904 年出版的《新国民读本》中更是明确地说：“军人乃强国之本”。与此同时，对于肩负如此重要使命的军人，人们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非凡的素质。军国民主义者突出强调了军人应有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担当精神铸其国魂，张吾民族箝制他种，宣扬国旗于全世界”^⑤。新军第 9 镇的统制徐绍桢给部下圈定的精神讲话主题中，也有“军国民为一国最高之国民，何以能不负其责任”、“军人何以受社会之尊敬”^⑥等近代政治气息很浓的问题。军国民主义的出现，为清末的军人素质观念增添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理念，使其趋于体系化。

清末人们对改造官兵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但对如何改造官兵素质，应使官兵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怎样使他们具有这种素质，当时人的认识却并不完全一致。当时对此问题发表意见的既有像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督抚官员，也有像康有为、梁启超一类的知识分子，还有从日本等国归来的军事留学生，以及在国内成长起来的新军军官。他们的观点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同时相互间还存在若多方面的联系。一般说来，督抚官员的主张比较实际，但趋于保守；而其他群体特别是军事留

① 《光绪政要》，卷 21。

②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 274 页。

③ 《国魂篇》，《浙江潮》第 1 期。

④ 蔡锷：《军国民篇》，参见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⑤ 蓝天蔚：《军解》，《湖北学生界》第 1 期。

⑥ 《徐统制通飭下级将校撰拟精神讲话呈核札》，《南洋兵事杂志》第 7 期。

学生的主张则比较激进，但有些不免流于空疏。本文涵括这一时期人们对官兵素质改造问题的主要看法，侧重于讲相同相似的观点（必要时也讲其认识的差异），希望能揭示清末军人素质观念的基本倾向。

二、新的军人素质标准的提出

（一）关于军官所应具备的素质

清末人们仍是围绕着德、知、能、体四个方面对军官素质提出要求，但传统的军官素质标准相比，其内容已有明显的更新，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1. 德

新的军官素质标准将传统意义上的“德”的概念外延化，包括了品质、精神、思想等许多近代观念，在表述方法上也常和上述词汇混用。当时人把“德”划分为“忠节、礼仪、信义、武勇、质素”^①五大要素。还有人按照对象的不同细分为“对一己之道德”、“对本军之道德”、“对社会之道德”、“对君国之道德”、“对敌人之道德”^②等。

所谓“忠节”，指“严守军纪，服从命令，以自己之身命为君国牺牲”。当时人将“忠节”摆在军人道德的首位，认为它是“军人精神中之精神”。军人效“忠节”的时象有人认为是国家，也有人坚持是君主，“君国”并称是一种折衷含混的说法，有着深刻的时代含义，在当时也最具影响。“忠君之义为我国二千余年未之国粹，亦为东西君主立宪国不易之常径。凡有血气，无不深知。至爱国二字之发见，乃因晚近帝国主义之潮流，日以加甚，不得不提出此主义，以为忠君之元素。盖君者，国之主体，一心惟知有君者，即一心惟知有国。分言之曰忠曰爱，合言一义字而已。”^③在这个说法中，近代政治观念与传统意识形态被顽固地揉合在一起。

所谓“礼仪”，“非单指敬礼而言，凡对人诸动作均谓之礼仪”，实指“上下之别，尊卑之分”。这种讲究“上下尊卑”的“礼仪”与“辨等明威”的旧式“军礼”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包含有较多的礼教纲常内涵。但也有人认为，近代军队的“礼仪”，

^① 剑飞：《论军人之精神》，《南洋兵事杂志》第1期。

^② 徐绍桢：《军队之精神》，《南洋兵事杂志》第6期。

^③ 端方：《督办大臣端方谕军人教育道德义务解释要义文》，《南洋兵事杂志》第30期。

是应该构筑在平等和民主的政治信念基础上，军人之间的人格与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军人礼节只是对职责和义务观念的强化。

所谓“信义”，“信者，实践躬行之谓；义者，能尽责任之谓。”尽管这种认识仍未脱传统之包装，但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它要求军人有身体力行和克尽职责的信念，认为军人是以牺牲自己天赋之“主权”和“自由”来换取国家之“主权”和“自由”^①。这些观念已与传统意义上的“信义”在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差别。

所谓“武勇”，指扫除中国文弱之风，从“胆力”、“沉着”入手养成勇猛、果敢的作风。“武勇”几乎是古今中外论兵者对于军人的一致要求，传统军人素质观念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针对中国“右文轻武之恶习”和近代战争的新特点，这一时期人们在“武勇”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卒然临予艰难困苦之地”，亦能镇定自若，“立决其进退取舍之途”，“尤宜力持刚毅坚忍之心，思作其一往无前之气慨。”^②

所谓“质素”，即“朴实节用，勿流于骄奢淫佚”，被当时人认为是“强毅之源泉、武勇之根本，军队之基础，军人之精神”^③。军人保持诚实质朴的本性，“富贵利禄之事，不得面沾；卑鄙齷齪之念，不得而生”，“对于公理公法，无纤微之惭愧，而正大不挠”^④，才能廉洁无私和公正严明。

不仅如此，在阐述对军人精神、军人道德的看法时，“名誉心、义务心、自信力、克己力、爱国心、爱群心”^⑤等词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有人更是认为“所谓军人精神者，不外国民之精神也。国民精神者，即以国家之观念为骨干也”^⑥。很显然，这里面已经融入了国家、民族等近代政治观念。

2. 知

甲午战争后许多中国人认识到，在近代战争中“雍狐孤父不足退其威，夏育孟贲无所用其猛”^⑦，只有用近代军事知识来武装军官的头脑，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清军的战斗力。袁世凯在编练

① 徐绍桢：《军队之精神》，《南洋兵事杂志》第7期。

② 四毋：《将校教育论》，《南洋兵事杂志》第2期。

③ 剑飞：《论军人精神》，《南洋兵事杂志》第1期。

④ 震飞：《练魂篇》，《南洋兵事杂志》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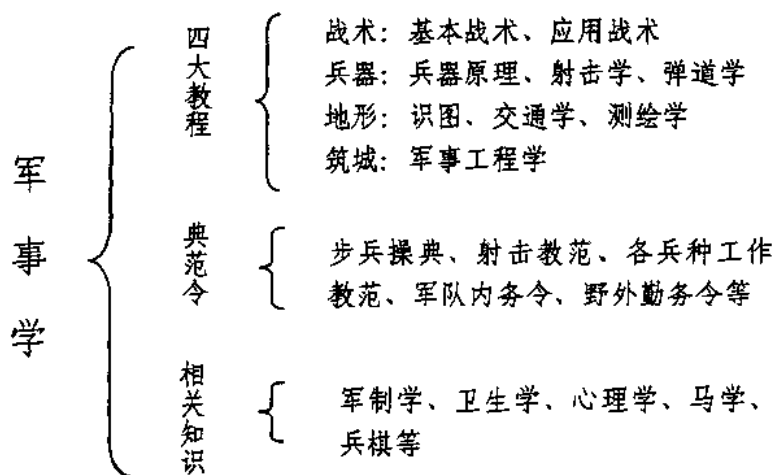
⑤ 其愚：《军队训练》，《南洋兵事杂志》第8期。

⑥ 庄谔：《军队教育与国民教育》，《南洋兵事杂志》第4期。

⑦ 廖寿丰：《武备新书·序》，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书局刊本。

新军之初曾上奏清廷，把“将弁必习韬略”^①作为练兵应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袁世凯所说的“韬略”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思辩性很强而可操作性很差的军事哲学知识，而是全新的近代军事科学知识。当时人认为军官不仅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够理解近代科技知识，还应懂得武器装备的工作原理和使用知识，以及工程、交通、测绘、卫生等与军事相关的各种专门知识，更应熟悉管理、训练的基本知识和近代战略战术。张之洞提出“上自统领、下自哨弁人人皆须通晓”的知识有：“教士以礼，使知有耻自重之法”；“调护士卒，居处饮食之法”；“讲明枪炮弹药质性源流之法”；“枪炮线路取准之法”；“掘濠筑垒避枪炮之法”；“马步炮各队择地借势之法”；“测量绘图之法”；“队伍分合转变之法”；“守卫侦探之法”；“行军工程制造之法”；“筹备行军衣粮辎重之法”^②。

将这一时期军事学堂的课程进行分类整理，可以清晰地看出人们时于军官知识结构的要求。当时的军校课程可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学科”中又可分为普通学与军事学。普通学主要包括：国文、历史、地理、外语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军事学可分为：



“术科”是“学科”的应用知识，包括：各兵种教练演习、乘马术、剑术、射击术、体操等。

对于军官知识结构中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比例，当时有人主张应该“以术科为主，以学科为辅”，他们认为：“军事上

^① 《袁世凯奏议》上，第28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4，第1433页。

一切事件尚实行，不尚理想”，“学科”只是讲明道理，“为术科实施之预备”；而“术科”通过经历实验，获得大量感性知识，“以期适合战争”^①。所以，“术科”知识应该成为军官知识的主体。

上述的知识结构所反映的只不过是出当时人对军官的一般要求，实际上，由于近代军队已经存在复杂的军兵种专业分工，人们对各类军官所提出的知识结构要求又是随军种、兵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比如，有人提出宪兵应该懂得：“普通学”，“方言学（外语）”，“军事学”，“普通法律及警察学”，“陆海军法律学”等^②。这里的“法律学”及“警察学”是宪兵军官必备的知识，但对指挥类军官就不做此要求。

3. 能

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军官能力的要求，把传统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与近代战争的要求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特色。当时论兵者经常把军官的能力区分为训练管理能力和作战指挥能力。

在训练管理能力方面，论兵者提出军官必须善于治兵，能把握好治兵的宽与严的尺度，做到“宽则情志相孚，甘苦与共”，“严则法立知惧，令出惟行”。并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以放纵为宽，势必纪律尽废，禁令不行，平居则殃害闾阎，临敌则违弃节度”；“以残酷为严，势必鱼肉军士，草芥部卒，平居则无所措手足，临敌则疾视如仇讎”^③。论兵者指出，这样的军官肯定是不合格的。

在作战指挥能力方面，论兵者提出近代军官应具备下列的四种能力：

一是有“战术上之理解力”。在战场上善于利用地形条件，灵活机动地使用战术。“地形全体之利害得失，一目即可判定。又凡距离之远近，形状之险夷，攻击、防御及通军之难易等，里至细事，亦得详悉。”

二是有“机敏之视察力”。在战场上能洞察敌情、我情，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对于敌我兵力、兵器、士气以及敌军意图的判断能“思考适切，精密无违算”。

三是有迅捷之“决断力”。而对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不是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而是“临事疾于决断而处置亦极速”，不

^① 《各标营宜重术科减学科移文》，《南洋兵事杂志》第1期。

^② 吴乃楫：《述宪兵学问之必要》，《南洋兵事杂志》第37期。

^③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训将要言》

丧失稍纵即逝的战机。

四是有心理上之承受力。能保持心态平和，理智清醒。“无论遭遇何事，均能不屈不挠，具有反冲之活气”，即使“际失望之时，决不为之辟易，且富有沉毅处置之胆力”^①。

4. 体

近代战争对军官的身体素质要求相对降低，与此相适应，当时很少再有人将拉硬弓、舞大刀等膂力条件作为评判一名军官的标准。对军官身体素质的普遍看法是，只要体格健全，没有暗疾，能够适应军队的艰苦生活即可。但是，身体标准的相对弱化，并不意味着对军官健壮体魄的忽视。军人作为一个与武力相联系的社会群体，孔武有力和威武雄壮的形象仍然受到人们的偏爱。“苟无健全之身体，则焉能锐意精进，战胜于竞争世界乎？”^②而且，“体力之练磨”还是促进“意志之巩固”的必要手段^③；平时强化体能训练，不仅可以清除懈怠、懒散和胡思乱想，还能够在锻炼中超越自我，坚定信心。

总超来看，清末人们关于军官素质的主张显得中西杂揉、新旧并存。一方而是对新知识、新精神的倡导，另一方而则是对旧的伦理道德的鼓吹。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是与这一时期中国朝野的政治信仰出现分裂，中国社会正处在重大的转折关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二）关于士兵所应具备的素质

甲午战争后，人们对士兵素质所提出的要求，也是德、知、能、体几方面，与对军官素质的要求相比，其具体内涵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点。

在“德”方面。要求士兵做到“忠、孝、义、勇”。所谓“忠”，就是“须凭一片血诚，替国家办事。……总要处处把国当作家看，我就是一国的子弟。国有急难，我是应派为国纾难的。”；所谓“孝”，“忠孝本属相联，这时正当移孝作忠，能忠即为能孝。况且功威受上赏，不成得大名，轰轰烈烈，留芳百世，自己何等荣耀，父母何等光辉，孝亲之大，孰过于是？”；所谓“义”，“并不是叫你们结盟拜会，作种种不善良的事情。不过要你们知道营中朋友都是将来为国打战、同处患难的。总要同自家兄弟一

^① 参见：四册：《将校教育论》和齐国璜译：《轻骑兵前哨卷一》，《南洋兵事杂志》第2期和第4期。

^② 庄谔：《军队教育与国民教育》，《南洋兵事杂志》第4期。

^③ 何浩然：《论青年官长（将校）当具之品性》，《武学》第3期和第4期。

样，相亲相爱。……平日讲惯义气，到战阵上必定齐心戮力，守望相助。”；所谓“勇”，是指“欲把忠君爱国的思想，时时提起，贪生怕死的念头时时铲净，养成一片血诚，替国家报仇雪耻。”^①不难看出，国家、民族意识已经渗入其中，这是与当时人对军官素质要求的共同之处。

其不同之处在于，人们还要求士兵能够“敬官长”、“守营规”。所谓“敬官长”，指士兵应该明白军营设官正是为了统摄他们，“下尽心以奉上，上必推心以待下”，这样才能上下有礼，成为“有制之师”。而且，士兵在军营中只能依靠官长，“既依恃之，即当爱戴之；既爱戴之，即当敬重之。能敬官，斯能用命；能用命，斯能效忠。”；所谓“守营规”，指“兵无纪律，势同乌合，众志不肃，安能御侮。……惟各怀廉耻，谨守法度，或推为仁义之师，或号为君子之兵，人莫不望而敬之，称而颂之，美誉流传，光荣非浅。”^②

在“知”的方面。当时人认为，“今日之兵卒，已非昔日之可比也”，士兵必须懂得最基本的技战术知识和战斗常识。“其最粗陋者，亦必能审视地图之方向，命令之旨归，而军纪、编制、军器、练习、资粮运便等与夫一切活动之方法，皆必通其大要，而后乃符兵卒之资格。”^③这与传统士兵素质观要求士兵愚钝无知、“朴实少心窍”相比，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

在“能”的方面。当时人主张士兵必须具备熟练的军事技能，“战阵攻守，兵之本分，技艺生疏，自取败亡，故练之必精，操之必熟。……及其既成，运用自如，可以卫身，可以卫国，可以博功名致富贵。”^④

在“体”的方面。当时人普遍认识到，士兵必须年轻力壮，他们良好的身体素质是实行艰苦和严格训练的保证，也是新军成为精锐之师的基础之一。在练兵处制订的《新订营制饷章》中，对士兵的年纪、身高、体质、膂力等条件作了详细的规定，反映出对士兵身体标准的高度重视。由于新兵入伍时，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所以有人还提出要注意加强卫生和体育，保证士兵身体的健康成长，因为“身体之健肃与心之发育上，大有影响。而思

^① 李铎：《训兵白话四则》，《南洋兵事杂志》第11期。

^②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训兵要言》。

^③ 武士：《说将才》，《武学》第2期。

^④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训兵要言》。

想之明了，感情之活泼，意志之巩固，均有关系。”^①可以说，对士兵身体素质的要求较之军官的相应要求严格的多，这正是为了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

三、提出培育军人素质的新办法

新的军人素质标准的提出，只解决了一个目标的问题。而如何达到使官兵具备新素质的目标，或者说，如何培育新的军人素质，构成了清末军人素质观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一）通过调整政策、制度来促进军人素质的改善

军人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他们整体素质的改善，有赖于吸收大批社会精英来充实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军人和他所从事的职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从而激发人们的从军热情。当时人认识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离不开政策、制度方面的调整。

张之洞 1898 年 5 月奏称：“近年东西洋各国，精研兵事，最重武职，其国君即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互相赠送以将官之衔。故人人以当兵为荣，以从军为乐，以败奔为耻。”他提出在中国也应使军人成为受人羡慕的职业，“爵禄所在，则杰士争趋，流品既殊，则廉耻自立，将领不肯侮辱，旁人不敢轻贱。”^②张之洞的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当时人还有人主张：废除有辱军人的陋习，“一切唱衔跪通，迎送长官之制，尽废之；翎顶衣冠，邦扶轿舆之风，严禁之；非大逆不道，则杀戮之条，削除之。”；应授予军人功名，“学生之博道者，与以进士翰林学位，以新天下耳目；兵卒之优秀者，与以秀才廪生学位，俾得社会之欢迎。”^③借此，以吸引社会上优秀青年人才进入军营，以确保官兵能具备良好的素质。

有人主张改革清军粮饷章程，提高官兵粮饷败额，改善其经济状况，以广招徕，使军队成为人才的集结地。张之洞说，“洋操勤苦严肃，毫无通融”，若非“厚给饷精”，“令其饮食丰足”，“断不能胜此劳苦”，“若若照旧日饷章，必无肯应募者”^④。袁世凯在编练新军时，也非常重视提高官兵的经济待遇，他认为“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急，悉力从公”^⑤。

^① 柯佐清编：《新兵教育草案》，《南洋兵事杂志》第 37 期。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48，第 1314-1315 页。

^③ 杨集详：《军国建议二》，《武学》第 11 期。

^④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40，第 1054 页。

^⑤ 《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 1。